

呵 护 语 言 的 家 园

——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评议

陈前瑞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提 要 李宇明教授的新著《中国语言规划论》充满着对中国语言文字家园的呵护之情。该书关注当代中国语言文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对汉语国际传播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的见解;探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相关问题,梳理语言规划的理论 with 历史。

关键词 语言规划 汉语国际传播 语言文字规范 母语

“中国正在向经济大国阔步迈进,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必须站到时代潮头,与时俱进地思考自己的工作如何才能跟历史车轮同速。”这是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对语言研究与时代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也是他为本文所评述的李宇明教授的新著《中国语言规划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8 月出版)作序时的深切感慨。

《中国语言规划论》收论文 27 篇,成四编。第一编是综论性质的,讨论当今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字工作等宏观语言规划的问题。第二编是专论,都是关于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第三编为分论,既有某些领域的语言规划问题,也有语言学的学术规划问题。第四编属于史论,讨论切音字运动的一些问题。这些论文主要是作者近 4 年在教育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工作岗位上撰写的,是从国家语言规划的角度讨论当代语言生活及其相关问题,是作者站在时代潮头思想的浪花。

在研读《中国语言规划论》过程中,笔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中国语言文字家园的一种呵护之情。

一、热情关注当代中国的语言文字生活

《中国语言规划论》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语言生活总体上是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新的词语、新的语法现象大量出现,新的语体、新的风格层出不穷。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当前语言生活也有许多新问题值得语言规划者思考:第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带来了语言之间的更大的不公平,并威胁着许多

语言的生存。第二,语言矛盾突出。这些矛盾主要有普通话与方言的矛盾,母语与外语的矛盾,以及一些语言与方言的濒危。第三,中国正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但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语在国际上还是“弱势语言”。(1—2 页)

中国语言生活的这些问题,正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有可能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赢得难得的发展机遇。作者工作在中国语言规划的重要岗位上,不仅始终热情关注当代中国的语言文字生活中的问题,而且还努力思考,提出许多宏观的应对之策。笔者比较关心当下的汉语国际推广问题,发现《中国语言规划论》在一些报告和文章中已经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的见解:

第一,提出了汉语国际传播的三个战略区域的设想。作者认为,从人群和地区来看可以划分三个战略区域:海外华人社区,传统的汉字文化圈(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辐射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要加强海内外华人社区的语言的沟通与协调,并与汉字文化圈以文化为基底结成语言同盟,再尽力向辐射圈辐射。比如可以建立这样的辐射步骤:先争取国际会议的汉语地位,再逐步争取较多的国际组织以汉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地位,争取汉语在汉字文化圈和辐射圈的主要外语的地位。(42 页)

第二,提出在考虑汉语的国际传播时,必须正确对待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作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看来仅有普通话(或者“国语”、“国家通用语言”)

的概念是不够的,它不能涵容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应该在语言规划层面有一个新概念——华语。华语,可以定义为“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海外华语的地位很重要,可以概括为三:1、海外华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不能轻视更不能放弃。2、普通话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向海外华语吸收了不少词汇,海外华语为普通话的发展做出了并将做出重要贡献。3、海外华语是汉语走向世界的“先遣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全世界的华人应当团结起来,全世界的华语也应当沟通起来。(65页)

第三,提出了促使汉语成为国际强势语言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要赶快编写一本全球华语大词典,以便于全球华人的语言沟通。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力促汉语进入外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培养会说汉语的外国人,更重要的是培养用汉语做事的外国人,乃至是对汉语、汉文化进行研究与传播的汉学家。应该有这么一个观念,国外多一个人说汉语,我们的国家就多一分友善。要鼓励团体和个人向国外推广汉语,包括在出口的商品说明书上附上汉语。要争取汉语成为更多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争取国际会议的汉语地位,鼓励人们在国际会议上用汉语演讲,维护我们的语言权利。汉语国际传播当前应考虑的主要途径是文化、教育、贸易和外交。注意争取汉语在联合国下属组织、华人社团组织、主张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地位,注意争取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大会、以华人为主的国际大会和讨论中国问题的大会上汉语作为会议语言的地位。(57页)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作者对汉语国际传播或推广的关注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中国语言规划论》中提出的一系列设想和措施也逐渐得到学术界与主管部门的共鸣。

二、着力锤炼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在信息时代,“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化进程和信息安全,影响到国家的综合实力。”(83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语言规划论》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中的多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和深度的认识和意见。

在《权威方言在语言规范中的地位》一文中,作者提出,如果将1956年的普通话定义再推展一步,就构成了由权威地域方言和权威社会方言纵横组合的“复合参照系”,即语音和词汇的规范不能仅参照权威的地域方言,也必须参照权威的社会方言,语法的规范不能仅参照权威的社会方言,也应参照权威的地域方言,即以基础方言的语法为参照点。这样,

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就具有了“权威方言的双重性”,进入了理想状态。(95—96页)“权威方言的双重性”以及“复合参照系”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丰富和严密了语言规划的理论认识。

一段时期内,有关规范词典的问题成了语言学界争论的热点,针对这一问题,作者提出,语文辞书和规范文件都是语言文字规范体系的成员,如果辞书不执行规范文件就会造成“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很严重的。如果辞书将规范文件中的明显不当之处照录不动,编纂者也的确学术良心难安。因此,“执行说”和“补正说”虽都有道理,但也都非良策,都属缺憾、无奈之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第一,规范文件制定时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辞书界和其他学界要积极参与,以减少制定文件时的失误。第二,对规范文件要及时更新维护。关键是建立对规范及时维护更新的观念和制度,发现问题能及时反馈及时更正。(144页)这些认识与办法应该说是中正客观的,有利于学术界理性认识语文辞书与规范文件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能够减少现实工作中的尴尬与无意义的争吵。

汉字是中华文化进入信息时代的第一道门槛,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超越这一门槛,其间所经历的困难和尴尬仍然记忆犹新,比如有些姓名、地名用字至今无法方便地录入。因此,尽快制定《规范汉字表》是语言规范标准建设的当务之急。作者并非文字学家,但在《规范汉字和《规范汉字表》》一文中仍然着力思辨规范汉字的时代性、地域性、领域性与规范性,仔细审视异体字的类型,并提出《规范汉字表》字级的基本设想:《规范汉字表》大致设想为三级。第一级为“常用字”,字量大约为3000~3600,主要解决基础教育用字问题。第二级(包括第一级字在内)为“通用字”,字量约在6000以上8000以内,主要解决社会通用字和新闻出版领域的一般用字问题。第三级为“特用字”,在前两集的基础上再加一些特殊用字领域的特殊用字,基本解决人名、地名、科技、中医药、考古等领域用字问题,基本解决大型现代汉语辞书、系列丛书用字问题,基本解决现代汉语的特殊用字问题。(159页)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建设,是一项严密而细致的工作。我们曾经因为某些规范的仓促出台而造成全社会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巨大耗费。历史的教训不能不让人谨慎思辨,殚精竭虑。

三、潜心疏通语言规划的学理

学理的疏通,既包括理论概念的思辨也包括学术源流的追寻。《中国语言规划论》在这两方面用词颇多,下面简单勾勒二三。

(一)区分母语和母言

母语,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一旦联系到复杂斑驳的现实语言生活,就可能引发各种误解,甚至被人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造成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纷扰。为了避免误解,作者在《论母语》一文中,潜心梳理国内外有关母语的各种定义,考察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不同发育形态,指出有必要依照语与言的区分,可以将统而言之“母语”再区分为“母语”和“母言”。当说一个人的母语是什么,问题的指向是民族共同语;当说一个人的母言是某某方言时,问题的直接指向是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变体,但也隐含着某人的母语是民族的共同语。

作者认为,母语与母言的区分,不仅有学理的意义,也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在一些方言势力较为强大、方言社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正确对母语进行表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比如母语权利的认定问题。由于母语涵盖母言,代表母言,因此,所谓母语权利主要是关于民族语的权利,而不是关于母言的权利。国际上提倡的母语教育或本族语教育,应当明确是提倡用民族的共同语进行教育,而不是提倡方言(母言)进行教育。比如在台湾,某些人正在大力鼓吹“本土教育”,用汉语的闽方言(或称河洛话)、客家方言等编写乡土教材,并强令儿童学习。在教材中反映乡土内容和方言文化,当然应该,但是教学用语应当采用民族共同语(即台湾所说的国语)这是由人们的母语权利决定的。

可见,《中国语言规划论》关于母语、母言的区分,对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母语教学乃至维系民族认同和促进国家统一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据笔者了解,鉴于母言的说法还不够顺畅,作者对母语与母言的区别又有新的思考,更倾向于将母言称为自然母语,把母语称为社会母语,从而更清楚地显示母语的双重属性。

(二)总结中国语言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作者认为,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语言学家的参与。因此语言规划也需要考虑语言学的发展,自觉把学术规划列入国家语言规划的一部分。(167页)《中国语言规划论》特别总结了吕叔湘先生的学术精神,把吕先生的学术精神概括为“学贵创新、谨严务实、重视语言事实、关心社会语言生活”。针对吕叔湘生前首倡的变换与动词的“向”等未能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作者认为,其原因不能直接归结为“中文的不通用”,而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第一,我国的语言学不是国际学术的制高点,“学术之水”

难以倒流;第二,理论提出者表述理论的方式不显豁,影响了理论的传播与继承;第三,我国学术眼光的聚焦点主要在国外,对本国的研究成果缺乏有意识的梳理,缺乏学派式的继承与发展,缺乏科学的学术批评。而且作者还痛心指出,这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因素今天并没有多少变化,若不努力革除,上述“变换分析”和“配价语法”的令人酸楚的“佳话”,肯定还会复现,那将是中国语言学的最大悲哀。

(293页)

(三)梳理清末文字改革家的一些重要观点

作者认为,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既是活生生的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又是世界语言规划史的灿烂篇章。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到清末至民国的各种语文运动,都是中国语言规划史上的壮美诗篇。研究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可以为中国文化史增添新的内容,并为当代语言规划提供史的借鉴。(295—296页)《中国语言规划论》有三篇论文着重梳理清末文字改革家的一些重要观点,即《切音字的内涵与外延》、《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清末文字改革家论语言统一》。比如作者在《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一文中指出,清代最末的20年,文字改革家已经非常关心方言问题。他们开始建立与当今相似的方言概念,讨论南派官话和北派官话的权势问题,讨论方言分歧对于交际、教育和国民团结的影响,涉及到了方言情感问题。其中许多观点今天重温起来仍发人深思,因为我国现在方言分歧仍然相当严重,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富国强民、普及教育仍是社会的热点话题。

中国的语言文字既传承着数千年的文明,也维系着九州大地的统一和海外华人华侨的精神家园的和谐。因此,任何语言规划政策都必须在疏通学理的基础上审慎决策。

《中国语言规划论》既是作者近年来用情、用力、用心呵护中国语言文字家园的一季收获,也是其根据工作与国家的需要主动规划个人学术事业的成果。此前,作者在国内语言学界中较早地投身于儿童语言习得领域,著述甚丰;稍后又专治汉语语法学,著有《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与《语法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02年)。几度更换学术阵地,其中艰辛与付出,但凡有过类似经历的学人都能够体会与理解。因此,衡量《中国语言规划论》这季收获的成色,也需要根据中国语言规划研究这块特殊领地的性质、历史、现状、趋势以及作者个人的学术背景来综合分析。